



宏观研究

【粤开宏观】从财税视角看贵州：茅台的“酒”能否解债务的“愁”

2022 年 09 月 26 日

投资要点

分析师：罗志恒

执业编号：S0300520110001

电话：010-83755580

邮箱：luozhiheng@y kzq.com

研究助理：贺晨、牛琴

近期报告

《【粤开宏观】弱复苏背后的隐忧：8 月金融数据点评》2022-09-10

《【粤开宏观】力挽狂澜：地方财政的困境与自救》2022-09-10

《【粤开宏观】8 月经济何以超预期，兼论稳增长政策的力量与边界》2022-09-16

《【粤开宏观】复盘本轮欧洲能源危机：特点、成因及影响》2022-09-18

《【粤开宏观】美联储破釜沉舟：9 月美联储议息会议点评》2022-09-22

摘要

贵州地处我国西南内陆腹地，山水相隔，地形破碎，土地贫瘠，不适农耕，素有“八山一水一分田”的说法。贵州经济长期相对落后，贫困人口、贫困面积、贫困程度都创下全国之最，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。自然条件限制下，全省经济发展呈现出总量小、人均低的特征，2021 年贵州省地区生产总值为 19586 亿元，排全国第 22 位；人均 GDP 为 50808 元，排全国第 28 位，仅高于甘肃、黑龙江和广西三省。

当前，贵州财政最鲜明的特点是债务问题，引发各方较大关注。中央和贵州陆续出台了化债的一系列政策文件，贵州仍处于化解债务风险的攻坚期。总体来看，贵州省财政主要具有以下七大特征：第一，财力吃紧态势加剧，对全国财政贡献为负，高度依赖中央转移支付，2020 年中央对贵州省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是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1.82 倍。第二，纵向收入分配中，省本级收入占比高，2020 年贵州省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比达到 26.3%。第三，工业及制造业基础薄弱，制约贵州省经济发展，造成全省税收来源单一、财政增收困难、抗风险能力差的局面。贵州省制造业贡献的税收占比低于三成，且主要集中于烟酒两大产业，技术密集程度较低。第四，创造的税收中消费税（中央税）占比偏高，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9.5 个百分点，主要源于贵州是烟酒生产大省，而消费税是烟酒行业中的重要税种。年报数据显示，2021 年贵州茅台缴纳的消费税为 120.6 亿元，占税金及附加的 78.8%。第五，财政收入总量低、质量差，税收占比在 31 个省份中排名最末。第六，财政自给率低位运行，财政压力由省级至区县级地方政府逐级递增，基层财政困境持续深化。第七，债务负担较重、化债压力较大。截至 2021 年末，贵州省负债率为 60.6%，超过国际警戒线水平，全国排名第 2；考虑隐性债务后，广义负债率攀升至 137.0%。

风险提示：地方财政形势超预期变化；



目 录

一、贵州省财政体制与税源结构概况	3
二、贵州财政形势：总量小、增速低，区域分化明显，自上而下财政收支矛盾逐级加大	4
三、贵州债务形势：债务规模大、负债率高，局部地区债务风险持续扩大	5



一、贵州省财政体制与税源结构概况

根据《中国财政年鉴 2021》《中国税务年鉴 2021》《贵州统计年鉴 2021》及贵州省各级地方政府财政决算报告，贵州省财政体制和税源结构呈现出以下特点：

第一，从对全国财政的净贡献来看，位于我国西部地区的贵州省对全国财政净贡献为负，中央转移支付对贵州省财政平衡起重要作用。2020 年，贵州省对中央财政的净贡献为-1985 亿元，在全国排名第 22 位，仅居黑龙江、四川、河南、湖北、新疆、甘肃、云南、湖南和广西之前。贵州省作为我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，经济基础薄弱、财力吃紧，对中央转移支付较为依赖。2020 年中央对贵州省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 3259 亿元，是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1.82 倍，成为地方财力的主要来源。

第二，从省以下财政体制来看，贵州省的省本级在纵向收入分配中相对集权。贵州省的省级政府需兼顾全省性重大民生支出，重点经济建设以及对民族地区、贫困地区、革命老区的扶持力度，因此收入统筹力度较大。2020 年贵州省省本级、市本级、县级及以下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比分别为 26.3%、22.0%和 51.7%。其中，税收收入在省本级、市本级、区县纵向间的分配比例为 20.7%、20.7%及 58.6%。茅台集团、贵州中烟、瓮福集团和盘江集团 4 户企业的企业所得税，中国移动通信等 13 户企业的企业所得税均为省级固定收入，除此之外增值税、企业所得税、个人所得税三大税种地方分享部分按省、市、县三级“2:2:6”比例分享。与税收收入相比，贵州省本级政府非税收入截留比例更高，2020 年非税收入在三级政府间的分配比例为 35.1%、24.0%和 40.9%，主要原因在于 85.7%的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归贵州省本级政府所有。

从支出来看，贵州省财政支出责任下沉区县，基层财政支出压力明显。从支出层级来看，2020 年贵州省省本级、市本级、县级及以下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占比分别为 20.3%、15.4%和 64.3%。与收入占比相比，区县政府支出责任更大，这样的财力与事权划分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基层政府收支平衡难度，需要通过省对下一般性转移支付予以补助。从支出结构来看，贵州省省本级、市本级与区县政府间事权划分较为分明。省级政府集中财力主要用于交通运输、农林水、社保和就业等基建和全省性重大民生性支出，城乡社区、节能环保、教育等方面支出主要由区县政府承担，以上三项支出中区县地方政府支出占比分别为 89.7%、81.0%和 80.8%。

第三，贵州省工业及制造业基础薄弱，制造业对全省贡献的税收低于三成，且主要集中于烟草和白酒两大产业，技术密集程度较低。从全国范围来看，贵州省工业基础比较薄弱、制造业实力欠缺。2021 年贵州省工业增加值全国排名第 22，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全省经济总量的 35.7%，远低于第三产业；在 2021 年中国制造业 500 强企业中，贵州省仅有贵州茅台和贵州磷化两家企业上榜，是我国顶级制造业企业最少的省份之一。制造业作为实体经济的基础，其发达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及发展高度，进而影响到税收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。2020 年贵州省制造业创造的税收占比仅为 27.7%，低于全国平均 3.2 个百分点；从细分行业来看，烟草制造业以及酒、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创造的税收占制造业的比重为 78.3%。

第四，从税种来看，增值税、企业所得税、消费税、个人所得税和契税是贵州省税收收入主要来源；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，贵州省消费税占比偏高，与其以烟酒主导的产业结构有关。增值税仍是贵州省第一大税种，2020 年增值税贡献了贵州税收收入的 36.3%。其次为企业所得税、消费税、个人所得税和契税，占比分别为 21.2%、17.3%、4.5%和 4.0%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，贵州省消费税占比偏高，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9.5 个百分点，主要源于贵州是烟酒生产大省，而消费税是烟酒行业中的重要税种。年报数据显示，2021 年贵州茅台税金及附加合计 153.0 亿元，其中消费税为 120.6 亿元，占税金及附加的 78.8%。相较而言，贵州省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占比偏低，



分别较全国平均水平低 6.3 和 2.6 个百分点。

二、贵州财政形势：总量小、增速低，区域分化明显，自上而下财政收支矛盾逐级加大

第一，总量低位徘徊、分布极化效应明显是当前贵州省财政收入形势的重要特征。西部地区是我国经济建设的薄弱环节。2021 年，贵州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 1969 亿元，仅位列全国第 22 名；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两年平均增速为 5.6%，排全国第 14 位。

贵州省财政的另一重要特征是极化效应明显。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看，省会贵阳及拥有贵州茅台的遵义在全省中占比颇高。2021 年贵阳及遵义两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别为 426.7 亿元及 270.2 亿元，占全省财政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21.7% 及 13.7%，是贵州省财政创收的中坚力量。除贵阳及遵义外，其余 7 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均在 60-125 亿元之间。区县方面，贵州省区县级财政自身的供血能力较差。一方面，是受自身经济发展水平限制；另一方面，也是贵州省收入上移分配体制的结果。2021 年，除遵义怀仁市（85.8 亿元）、贵阳观山湖区（58.0 亿元）两个区县外，其他区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均低于 50 亿元，其中 55 个区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低于 10 亿元。

第二，贵州整体财政收入质量较差，财政收入的稳定性有待加强。相比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，税收收入是经济发展结果的最直接体现。2021 年贵州省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 59.8%，在 31 个省市中排名最末，比倒数第二名宁夏的税收收入占比还低 5.6 个百分点。分地市来看，贵州省各地市税收收入占比有一定分化。税收收入占比最高的贵阳（76.9%）与占比最低的黔西南州（40.2%）相差 36.7 个百分点。除贵阳与遵义外，贵州省其它地市税收收入占比均在 70% 以下。

第三，贵州省财政自给率持续低位运行，财政压力由省级政府至区县级地方政府逐级递增，财政“紧平衡”形势严峻，基层财政困境持续深化。2021 年贵州省财政自给率为 35.2%，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，居全国第 22 位。在地市层面，各地市财政自给率与当地经济发展程度高度相关，极化效应依旧明显。省会贵阳市自给率相对较高，2021 年财政自给率为 62.6%。贵阳以外的 8 地市财政自给率均较低，在 14%-35% 之间低位徘徊。地方政府财政自给能力明显偏弱，财政困难现象普遍且程度较深。从区县来看，贵州省地方政府财政困难表现更加深刻。2021 年，贵州省 88 个区县中，财政自给率超过 50% 的仅有 7 个，分布在贵阳（5 个）、遵义（1 个）和黔西南（1 个）三地。财政自给率排名靠后的区县大多属于黔东南、铜仁等发展程度相对更低的地区，其中铜仁市沿河土家族自治县财政自给率甚至低至 6.8%。贵州省区县级政府财政自给能力弱于省级政府，财政困难现象普遍且程度较深，基层政府面临较大财政风险。

第四，从政府性基金收入看，贵州省政府性基金收入增长迅速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量较小，导致地方财力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高。2021 年贵州省的政府性基金收入为 2381 亿元，排全国第 16 位。2020-2021 两年平均增速为 18%，仅次于上海（24.8%）、江苏（21.4%）与吉林（18.8%），位列全国第 4，增长迅速。在地级市层面，贵阳市仍然以 788.3 亿元遥遥领先。遵义市（454.7 亿元）、黔南州（260.2 亿元）两市政府性基金收入紧随其后。其他城市政府性基金收入规模均在 200 亿以下，分布在 60-160 亿元之间。

以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/ （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+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）来近似衡量贵州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。2021 年，贵州省土地依赖度高达 54.7%，高居全国第三位。由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低，贵州省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较大。地市层面，贵州省所有地市土地财政依赖度均超过 50%，土地财政在补足财政缺口中发挥重要作用。其中，黔



南州、铜仁市和贵阳市的土地财政依赖程度最高，政府性基金收入占两项收入之和的比重高达 69.3%、67.3%和 64.9%，黔东南州、毕节市和安顺市对土地财政依赖程度较低，分别也达到了 55.1%、51.9%和 50.4%，均超过 50%。

三、贵州债务形势：债务规模大、负债率高，局部地区债务风险持续扩大

第一，债务规模大、负债率高、付息压力大是贵州省地方债务的重要特征。截至 2021 年末，贵州省政府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 11874 亿元，较 2019 年增加 2201 亿元，两年平均增速为 10.8%。考虑地区生产总值后，2021 年贵州省负债率为 60.6%，超过国际警戒线水平，在全国 31 省份中排名第 2，仅次于青海省。高负债率使得贵州债务付息压力加大，尤其是专项债务。2021 年贵州专项债务付息率（专项债务付息支出/政府性基金支出）达到 6.6%，在全国 31 个省份中排名第 5。随着房地产进入下行周期、土地出让收入下滑，政府性基金收入对专项债务利息的覆盖能力进一步下降，可能触发财政重整条件，影响地方政府正常运转。

第二，贵州省各地市债务余额普遍较高，4 城债务规模达千亿级别。贵阳债务余额最高，2021 年债务规模高达 2499 亿元，占全省债务余额的比重达到 21.0%。遵义、毕节及黔南州紧随其后，债务规模均超过 1000 亿元，其他地市债务余额也在 600 亿元以上。从负债率来看，贵州省各地级市债务负担均较重。2021 年贵州省负债率水平最高的是黔南州，达到 61.2%；其他地市负债率均分布在 40%-60%之间，负债率最小的遵义市，也有 42.6%。在区县层面，贵州省债务形势进一步恶化，88 个区县中，2021 年负债率超过 60%警戒线的有 13 个，其中黔南州的三都水族自治县最高，达到 106.9%。

第三，除显性债务外，贵州隐性债务规模与化债压力均较大，广义债务率居全国第二。随收支缺口拉大，地方政府隐性融资冲动强烈。截至 2021 年底，贵州省城投融资平台形成的有息债务规模达到 14799 亿元，是显性债务规模的 1.2 倍。以（地方政府债务余额+融资平台有息债务）/GDP 测算地方广义负债率，则贵州省广义负债率攀升至 137.0%，在 31 个省份中排名第 2，仅次于天津市，债务问题已成为地区发展的重大挑战。分地市来看，安顺、贵阳和六盘水三市广义负债率均超过 100%，其余地市在 75%以上。

贵州省债务困境既有发展阶段的原因，也有深层的制度原因。一是有限的财政收入与民生保障、产业发展所需的财政支出不匹配。随着经济增长动能转换，贵州省烟酒、能源等传统支柱税源增速下降明显，新兴产业税源尚未形成规模，难以有效支撑财政需要。二是财权与事权分配失衡，财政收入上划，层层分割，支出责任下移，层层下推。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_46423

